

岫廬文庫 ○五

王壽南  
陳水逢  
主編

李雲漢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國現代史論和史料 下冊

李雲漢著

中國現代史論和史料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

往车东、之而反，政大政研不许。  
考游集文力高。考才人情多苦故。  
上不常极也。结足以友想。许君子。  
人余一文外，乞而以海喻。与幼弟。  
加年三十人，歲以奉於之。肩角度。

の本写照。今はあ+妹文、紫利寺  
朱経日赤和酒波え玉雲の先生。當  
首月次先生を收、を三波二村水美、火薙  
年而九秋、時因心臓衰弱の故が弟  
ち羊ろ色砂拂。廣海詩子以文あ  
あ惟翁家がある者有其人か一文豪

集第廿六助人久一也、為歎至不之  
也。既厚學幼性、之過何似久遠也。余  
亦嘗嘗嘗詣聖哲、而入焉。耗焉士枯神。  
余久人以、以為殊色、有力効椒銷  
毫端而乃。而里以東、余北洪村梅  
既不復、在於產者、吾以之較也。於之

設計興努力、併正職多得增加或對  
滿輕稱外、三度徵考科名教授之列  
力擧大學者、也有十餘人矣、三百冊、  
一年內僅破敗稿、是數十本也、先諭  
充金助械、你乞、我、先諭  
也、乞、你軍需司、自己被事一  
生。

所望、そひて東延頃の方、の以年支  
御時、萬の健郎を賣り、萬もり保々  
資原、至ウ在れ當時取以、拂至被み  
ト、其處物販貿子り初以、得て、厚  
い、ゆゑす、左、金幣、火、か董お市、而、中國  
水、えあふる、以也、立、宣、方、岐、把、是

勅改國。一猶古俗。後漢楊衡曰。列典  
為君臣。於此有別。收權者。向時稱  
與。有主體。而無事。又無事。又無事。  
為後世。十有二事。考之。皆有之。蓋  
以多寡。以爲美。考之。又無之。蓋  
未立。又無。考之。又無。布政于內。立  
事。

院に立てて、室を、且轉身せば皆化已  
水せぬ者也が方竹葉の友志を了  
乃々造福が廣大讀也界、弘万隆也  
ありえ葉、根株の三方量れ上其ある  
至りま瑞之處、常有詩句は其文字殊可矣  
玉あわわあわせ其えや福也二事より

勅第<sup>ノ</sup>が移行せぬ事多<sup>シ</sup>也。乞  
故物<sup>ヲ</sup>以<sup>テ</sup>送及<sup>シ</sup>此<sup>ノ</sup>候。預計<sup>ト</sup>來<sup>シ</sup>有<sup>リ</sup>當  
時<sup>出</sup>及<sup>シ</sup>事<sup>ヲ</sup>が<sup>サ</sup>終<sup>ス</sup>、次<sup>々</sup>後<sup>日</sup>過<sup>月</sup>也<sup>。</sup>乞<sup>フ</sup>此<sup>ノ</sup>  
是<sup>一</sup>擇<sup>候</sup>事<sup>也</sup>。或<sup>以</sup>時<sup>ハ</sup>、<sup>シ</sup>許<sup>済<sup>シ</sup></sup>事<sup>也</sup>。  
終<sup>ニ</sup>有<sup>リ</sup>方<sup>舟</sup>、<sup>シ</sup>乞<sup>フ</sup>先<sup>駆</sup>！

水<sup>木</sup>又<sup>國</sup>中<sup>ノ</sup>事<sup>有</sup>古<sup>王</sup>而<sup>無</sup>漢<sup>之</sup>謀<sup>。</sup>

## 編者弁言

本（六十六）年七月十六日（舊曆六月初一）欣逢吾師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爲表示崇德報恩的敬意，研商如何安排一項有意義的祝壽活動。當岫廬先生八秩晉八華誕時，曾由其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分別撰寫文章，合編而成「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一書，表示對岫廬先生的感佩與仰慕。今年恭逢岫廬先生九秩嵩壽，應該有一項意義同樣重大而範圍更爲廣泛又能傳之久遠的祝壽活動，於是乃發起編輯「岫廬文庫」，因爲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多半從事教育文化工作，他們缺乏財力來爲岫廬先生作盛大鋪張的祝壽節目，而生性淡泊的岫廬先生恐怕也不會同意那些鋪張浪費的節目。以文爲壽，乃是中外學者共有的傳統，因此，我們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先生商量，由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撰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岫廬文庫」，以「岫廬文庫」爲岫廬先生壽。「岫廬文庫」的出版，不是空言對岫廬先生的歌頌，而是每一位著者以他的筆耕成果，恭恭敬敬奉獻給他們所敬愛的長者——虔誠地爲九十高齡的岫廬先生祝福！

岫廬先生是位蜚譽國內外的學者，幾十年來，在政治、教育、文化、社會工作

各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是了不起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岫廬先生的苦學成功，早已成爲年輕人努力奮鬥的楷模，成爲老師們訓勉學生努力效法的榜樣，岫廬先生實在是當代中國對國家社會極有貢獻而且有深遠影響的偉人。「岫廬文庫」的著者們以岫廬先生爲榮，他們把筆耕的成果呈獻給岫廬先生，乃是表示他們願意效法岫廬先生的精神——個人的努力是爲了國家社會的利益，他們的著作希望能爲當前中國的學術文化界盡到一份知識分子的心力。

「岫廬文庫」要從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吉日開始長期出版下去，嗣後每月有新書出版，種類與冊數視實際情形而定。在內容而言，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爲主，但其他方面如果有富有價值的作品，也將酌情納入。爲了攜帶方便，「岫廬文庫」採用四十開本印刷，每冊字數以五萬至十五萬字爲原則，以出版新著爲主，古籍舊書不予納入。在岫廬先生九秩華誕的前夕，我們虔誠地祝福他老人家永遠健康愉快，同時也向對國家社會具有多方面貢獻的岫廬先生謹致最高的敬意！

陳水逢  
王壽南 謹識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 抗戰前中國知識份子的救國運動

一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中華文化大樓講

## 一、抗日救國的種子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他倡導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得中國的自由與平等。

中山先生所懸示的這一目標，正是革命黨人犧牲奮鬥所追求的救國理想，也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與愛國人士所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質言之，近代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是要把我們的國家從清末那種衰弱落後面臨滅亡危機的悲慘境地中挽救過來，在中國固有民族文化的基礎上融和新的潮流與學術，以建設成一個莊嚴燦爛，永久適存於世界的新國家——也就是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

主的、強大的、繁榮的現代化的新中國。

要建設這樣一個獨立自由，統一強大，民主繁榮的新中國，第一步就要先把那些使我們國家民族不能夠獨立自由，統一強大，民主繁榮的因素剷除，也就是要帝王國主義國家強加於我們身上的镣銬先行打破。近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是一部充滿了血淚的國恥史，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凌與刦奪，更結成了半個世紀以上骨嶽血淵的深仇。因此，在我們建設現代化新國家的奮鬥道路上，首先遭遇到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這一強敵。

從甲午戰爭割取中國的領土臺灣澎湖開始，日本當局未嘗一日放棄侵略中國的企圖，中國的愛國志士和知識份子也未嘗一日停止過對日本的規勸或抗拒。辛亥革命前的歷史不必重提，單就民國開國以後的二十年間，如二十一條的提出，山東權利的攫奪，五卅慘案的釀成，濟南慘案的製造，皇姑屯車站的謀殺，以及田中義一對華侵略政策的決定等事件，沒有一次不是處心積慮的侵略與挑釁行爲，這些事件在已經覺醒了的中國國民心理上刻下了創深痛劇的烙印；在羞辱與悲憤的情緒交織下，知識份子勇敢而堅毅的承擔起抗日救國的重擔。尤其自十七年五月三日濟南慘

案發生後，上至政府下至每一個國民無不引爲空前的奇恥大辱（註一），復仇的火種已在每個人的心底裡埋藏下來，當時在強弱異勢內賊未靖的情勢下，政府不能不暫時忍下這口氣，也勸諭我們的愛國同胞忍耐於一時。但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人一口吞去了我們東三省的沃野，因而觸發了中國知識份子久已蟄伏在心底的怒潮，抗日的烈火就像初爆的火山，震動也照澈了每一個角落。

## 二、救國愛國與禍國誤國的分野

「九一八」！這一慘痛日子的歷史意義太重要了！誠如傅斯年所說：「『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也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註二）就從這一天起，我們中華民族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國難時期，幾乎每一個有良知，有感覺的中國人，都像遭受到雷擊一樣的從驚恐中躍起，呼叫！

對於國難感觸最敏感，情緒也最激昂的，當然是集中在各大都市中的知識份子。幾乎就在獲悉「九一八事變」這一不幸消息的同時，他們的行動開始了。集會，

組織抗日救國團體，發表通電宣言，遊行、請願，要求政府宣戰，主張嚴懲不抵抗主義者。最初只是知識份子奔走呼號，隨即有工人、商人及各界人士一體響應；最初只是十多個大都市，稍後波及於全國大部分的省區，最初只是基於純潔的愛國熱誠，其後却有政爭的陰謀混雜進去。這樣呼號奔走了一段時間之後，這才痛定思痛的冷靜下來，面對着禍患日深的國難，考慮應有的態度和作法。在此後六年的苦難歲月裡，知識份子們很明顯的表現出三種類型，也代表出三種不同的路線——

第一種類型是一部分有資格作社會導師的高級知識份子，代表的路線是嚴正的民族大義和理智的救國主張。他們都是望重一時的名流學者，不是學術界的領袖，就是新聞界的鉅子，有明銳的世界眼光，豐富的國際知識，以書生報國的真誠，持淋漓磅礴的正氣，從言論、著述、論政、致仕等方面，為國家民族貢獻了忠盡與智慧。尤其是服務於北平危城被稱之為「北方學統」的一羣（註三），他們的言論和行徑，形成了華北政局主要的安定力量，於國防第一線上建立起民族精神的萬里長城。（註四）

第二種類型是以各大學學生為主體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在應付國難的行動中

，表現出的色彩是激動的愛國主義。他們曾在民國二十年和二十一年的冬、春之季，以及二十四、五年度之內，發動了幾乎是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形成了國難期間所謂「學生民族主義」（Student Nationalism）的一股激流（註五）。由於青年人的情感易於衝動，其中自然有些人被共產黨和野心家所利用，以致表現出偏激和越軌的行動來。但絕大多數的青年知識份子，其動機乃出之於純正的愛國熱忱，他們聲嘶力竭的呼喊與奔走，有助於國民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抗日情緒的激揚，則是無可否認的史實。

還有第三種類型的人——多半是「救國會」系統下的那一羣，他們是高張起「抗日救國」的旗幟，從事於破壞國策爲匪張目的陰謀（註六）。這些人也是屬於知識份子階層，而且也有幾位是所謂「知名之士」，但他們囿於私見和私利，完全湮沒了知識份子的良知，在大敵當前的危境中，進行反政府的活動，名爲「愛國救國」，實則害國禍國。他們既已脫離了愛國救國的正路，就沒有資格列名於知識份子救國運動的陣營，本文也就不屑於齒及他們。下面僅就第一、二兩類知識份子的救國運動，以一個歷史研究者的眼光，作一敘述、分析和評價。